

# 闽东畬族的革命斗争与党的民族政策

● 吴用耕

畬族是我国东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据1982年人口普查,福建省畬族人口有208495人,约占全国畬族人口总数的57%。他们分布在全省64个县市,其中以闽东地区最为集中,有166941人,占全省畬族的80%。

史载,畬族原属于“百越”的一支,早就聚居于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其后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欺凌而被迫不断迁徙,从一个聚居的民族发展成为一个大分散、小集中的散居民族,“所居在丛菁蓬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无比屋而居者。”(《建阳县志·卷二》转引自蒋炳钊编著《畬族史稿》)

“畬民”的称谓早在南宋就有记载。《连江县志》载:“畬民,五溪瓠之后也”。唐光启元年(885年),畬族王姓的祖先曾为闽王王审知的乡导官,曾在连江马鼻登岸而后迁往罗源、闽东各县。畬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文字、通用汉文。畬族妇女,至今仍梳“凤凰头”(或盘龙髻,保持“凤凰装”(五色花线镶边加飘带)。畬族人民勤劳、勇敢、俭朴、醇厚,保存和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如山歌、民谣、史诗和故事传说,表现了畬民的聪明与智慧。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我国各族人民苦难深重,畬族也不例外。随着福州、厦门辟为五口通商口岸,福建首当其冲地成为外国商品的倾销地,穷乡僻壤也不能幸免,这使得畬族地区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被破坏。在帝国主义掠夺和封建官僚、地主的压榨下,广大畬民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穷困破产,文化极端落后,还得承受民族歧视的痛苦,过着“野菜作粮草,生姜当油炒,竹蔑当灯点,火笼作棉袄”的饥寒交迫、血泪和流的悲惨生活。

解放前,畬族地区生产资料占有明显不均,少数地富占有大量土地,广大贫雇农则无地或少地,中农大部分租种地主土地,形成佃中农多,自耕农少。据对福鼎、福安、霞浦、宁德、罗源等县畬族3280户调查统计,地主占0.7%,富农占1.18%,中农占20.01%,贫农占33.95%,佃农占4%,其他占0.03%。闽侯县飞坑乡约50户畬民,全部是外乡汉族地主的佃户。连江县总洋村畬民32户,只有自耕地5亩,畬民人均3厘田。福安县仙岩畬族村,自耕田仅20亩,全村每年向地主纳租7万多斤谷子。畬民向地主纳租分为定租(铁板租)、分租、劳役地租等几种,租额高达收获总数的60—70%。往往是秋收刚过就断粮,“镰刀挂上壁,肚子贴腹脊”。

畬族农民借高利贷相当普遍,向地、富借粮借钱利率达50%到100%。宁德县洋头村289户畬民,每年向地主借粮6万斤,秋收时还9万斤,如剩余尾欠,来年变成母本,利率照算,几辈人欠下的债如滚雪球,还也还不清。

反动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犹如一把把利刀架在畬民的脖子上。30年代初,国民党摊派的各种捐税竟达34种之多。从政府官员到保甲长,只要勒索念头一动,就可以制定一种捐税,向畬民要钱。要是无钱,就抓鸡、掏鼎、劫物、抓人。福安县仙岩村,畬民每户每年要负担各种捐税折谷子200斤。

国民党政府强征青壮年当兵,充当内战炮灰,在各县实行“四抽三、三抽二、单丁匹马也要行”的抓丁政策,弄得畬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福安燕洋畬乡330户中一年被抓丁53人,罗源八井乡192户,被抓丁48人。这些被抽去的壮丁,大都有去无回。宁德南山畬村被派丁52人,因抓丁派饷引起妻子改嫁,卖田卖地而绝户的就有34户。

畬民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还受到反动统治阶级民族歧视与侮辱,被诬称为“兰雷仔”、“邪客婆”、“蛇婆”等。畬民挑柴进城求售或为人抬轿做工,经常受到地方豪绅、兵痞等辱骂或殴打,有时还被抢走东西。

广大畬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贫苦农民每年缺粮

都在6至8个月以上,只好以米糠、麦皮、蕃薯叶或野菜充饥。寒冬腊月,只着粗麻单衣,烤火御寒。许多人被迫卖妻鬻子,背井离乡。如福安燕洋乡330户中,有32户沦为乞丐,其中20人死在外乡,有13户卖妻,26户卖子。凤洋村也有5户卖子,10户典妻,11户行乞。宁德南岗村因1934年瘟疫流行,1个月内死去40多人,霞浦草岗村50多户,从1930年至1943年间,病死109人。据《福鼎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八斗洋、小麻洋两地有畲民3万多人,到解放初期,福鼎全县畲族人口只剩16100人(引自钟大潮:《闽东畲族革命斗争纪实》)。

正因为畲民苦大仇深,痛苦难言,迫切要求翻身解放,革命愿望最强烈,“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弱小民族是反帝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是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的一种酵母、霉菌”(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 2

闽东地处福建沿海,党组织成立较早,畲族因而成为参加我党革命斗争较早的少数民族之一。当年闽东苏区主要领导人叶飞说:“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中,畲族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党支持最大。’”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对闽东畲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的表现的独具特色的高度概括。

畲族由于地理、经济、民情、风俗的不同,在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既有和汉民族相同的一面,又有着自身的特点,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

一是广泛性。“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明确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除了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外,还具备以下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闽东畲族大都聚居于高山,那里森林密布,溪流交错,物产丰饶,利于红军隐蔽游击而不利於敌人兵团作战。党和红军凭借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屏障,保存发展了自己的力量。革命斗争赖以发生发展的基础是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当年畲族山村的大男小女无不踊跃投身革命,年纪大的男人成了苏维埃干部,年轻的则加入红军游击队,妇女则充当交通员,儿童成立起儿童团,老年妇女成了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妈妈。闽东绝大部分畲族山村成了革命根据地。据对福鼎、寿宁、福安、柘荣、霞浦、古田、屏南、宁德、连江、罗源等11个县统计,80%以上畲族村庄解放后都被评为革命老根据地基点村。党团及苏维埃、赤卫队、肃反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在畲村如雨后春笋,广泛建立。1938年2

月,由叶飞、阮英平率领的闽东红军独立师1300多名指战员,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北上抗日,其中畲家儿女就占了220多人。红军北上后,留下来的畲族骨干坚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据1949年5月统计,闽东11个县份共恢复建立畲族支部37个,党小组28个,拥有党员453人,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员261人,抗日战争时期党员40人,解放战争时期党员152人(钟大潮:《闽东畲族革命斗争纪实》)。

从畲村受摧残的严重程度也可看出畲族人民参加革命的广泛性。据霞浦县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1953年统计,全县被敌人完全烧毁的老区基点村有17个,其中畲族村13个,烧毁房屋2251间。受灾群众306户,1707人,其中烧死226人,被杀60人,饿死病死的266人。闽东11个县份畲村被烧毁135个,房屋10500多间,被杀党员、干部和群众达5000多人,其中已评为革命烈士的有510人,占烈士总数7%(畲族人口占闽东11县5%)。

二是坚定性。畲族人民由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因而参加革命斗争义无反顾,其果敢、坚定、韧性,团结精神尤为著称。无论是革命高涨时期或是革命低潮时期,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还是在凄风苦雨的铁窗中,或是在鲜血淋漓的刑场上,畲族战士都表现出钢铁般的忠贞与坚定。这种坚定性来源于对革命理想的憧憬,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来源于素有抗暴御侮的民族自卫传统。惠安县涂寨乡新亭村的兰飞鹤烈士是畲家的骄傲。他早年就读于厦门集美师范学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过中共福建省委特派员、泉州特委组织部长等职。1930年在震撼闽中的惠安暴动中担任红二团团团长,身先士卒指挥战斗,暴动失败后被民团逮捕、任凭敌人百般威胁利诱,始终坚贞不屈。他在狱中赋诗:“横胸铁血扫难开,浩劫摧磨志不灰。满地铜驼荆棘变,游魂应逐战旗来。”

福鼎双华乡共产党员兰青改,1936年10月被捕,押解浙江平阳县,敌人软硬兼施,他咬紧牙关不露一字。敌人恼羞成怒,把他心肝挖出来。牺牲前他大声呼喊:“我们‘山客’一定要革命到底!”

三是保密性。保守党和红军的机密,刺探敌人情报,完成交通联络任务,修筑“秘密楼”,掩护党、苏维埃各级干部、红军游击队战士,宁可牺牲生命也守口如瓶,决不向敌人示弱。这既受到民族自卫传统的影响,也是党的培养、艰苦奋斗环境磨炼的结果。革命战争年代,闽东红色区域畲族各村都有红色交通员,他(她)们栉风沐雨,翻山越岭,递送情报,采购物资掩护红军。复杂多变的对敌斗争环境锻炼了他们的胆略与睿智。仅送信一项,方法之巧妙灵活,临敌之镇

静自若,令人惊叹。有的把密信卷藏在竹竿里,手执竹竿盘山过岭。要是夜间,既可以当拐杖点路防身,若是遇到敌人,把竹竿一扔了事。冬天常把密信藏在火笼底下,以借火取暖瞒过敌人。如遇意外,把信件捻入火中,化为灰烬。有的把密信塞到斗笠的夹缝里,或缝到补丁的衣折中,有时拔几根茅草把密信和小石块扎在一起,要是遇上敌人,扔到草丛中。宁德巫家山畲族女交通员兰彩容,有次送信到半路,碰上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当即把信团扔到就近的草丛里,被敌人看见,追问她扔什么?兰彩容急中生智,又扔出手里第二个、第三个石子应道:“我在打小鸟”。敌人找不出破绽,就“放”她过去了。

畲民的保密具有群体性。1936年,福鼎国民党保安队逮住了白石村畲民李阿琛等4人,在押送县城途中,李阿琛悄悄地操畲家话说:“杀头也莫讲哟!”他们被敌人隔离,一个一个审问,动用刑罚:灌辣椒水、吊打、甚至拉去搞假枪毙,却没有一个人暴露红军的秘密。福安县畲族老党员钟阿尔是中共寿宁县县委常委。敌人指名要抓他,他改名“土溜”,躲进太阳山隐蔽13年之久,村里畲族群众无人不晓,却没有一个去告发。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东畲家的“秘密楼”贡献卓著。这种山寨、草房既是红军的掩蔽所也是临时医院、枪械修理厂。畲民冒着生命危险,躲过敌人盘查、搜捕,千方百计往楼里送粮食、食盐、药品、衣服,不少人为保护“秘密楼”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叶飞、范式人等闽东主要领导人都住过畲家秘密楼,范式人深有感触地回忆说:“山上最可靠的是畲民,海上最可靠的是渔民”范式人:《闽东革命斗争的回忆》。

3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坚持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与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推翻三座大山,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这与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大汉族主义,歧视与压迫少数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闽东地区的党组织对畲族的民情社情了如指掌,对畲族同胞的苦难深表同情。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革命,鼓动畲汉群众拧成一股绳,推翻吃人的剥削制度,赢得了畲民的信赖。畲民缺吃少穿,啼饥号寒,又大多租种汉族地主的田地,各地党组织适时地引导畲汉贫苦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的“五抗”斗争,有的地方组织“反烟捐委员会”,反对与抵制反动政府强征烟苗捐,对地主实行“二五减租”,进而拖租、抗租,抗债,迫使政府答应减免租税,地主少收租谷。这些斗争使畲民得到了实际经济利益,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为畲家人谋利益。心诚则灵,畲民和党的心贴紧了,也初步显示穷人团结斗争的力量。“五抗”斗争激化了阶级

矛盾,地主的反扑与畲民的反抗造成尖锐的对峙,土地革命风暴在畲族村落的卷起就成为必然了。

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福建各地党组织在领导分田斗争时响亮地提出“畲汉同等对待”的口号,体现畲汉两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赢得畲族人民衷心的拥戴。闽东11个县畲族聚居地有3个区、21个乡、300多个村成立起苏维埃政府,畲族穷苦农民破天荒地拿了印把子,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福安山头庄、小岭村畲民每人平均分田一亩。霞浦五斗、龙潭等畲村每人分到水田七分。连江总洋畲民不论大小口分得水田四斗(相当于二亩)。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家属还分到双份田。共产党把畲家儿女世代代“耕者有其田”的宿愿化为现实。在庆祝分田胜利大会上,福安畲民欢天喜地地唱道:“乌云盖了几千年,红军来了晴了天,封建势力连根铲,工农翻身作主人。受苦畲民出火坑,打倒地霸分田园,木槌蒙皮当鼓打,犁头串线作琴弹。”

“畲汉同等对待”还表现了党重视培养畲族干部,动员畲家子女上学堂读书,在畲村办夜校,教成年人识字,提倡男女平等,宣传婚姻自由。闽东苏区11个县中,共建立畲族党支部20多个,发展党员200多人,畲族担任县(团级)以上干部22人,区(营)级干部55人,乡(连)级干部92人,村苏干部近2千人。

国民党对“闹红”的畲村实行烧杀抢掠,给畲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共产党则与此相反,党的领导人处处爱护畲族群众,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尊重畲族民族风俗习惯。1932年底,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到连江畲村洪塘巡视,和县委书记杨而菑在交通员兰礼义家吃饭,忘了带钱,两人当即把刚发未穿的新袜子当作饭钱硬要兰礼义母子收下。文殊畲村一畲民为感激红军游击队帮他割稻,送来一筐田螺、泥鳅,杨而菑交待党员宋遵茂过秤后将钱送到畲民家中。党组织教育党员自觉尊重畲族群众的风俗习惯。畲民禁狗,忌呼狗,红军游击队规定在畲村驻地不杀狗。逢年过节或是遇上畲民婚礼,苏维埃干部和红军指挥员到畲家拜年祝贺,和宾客们一道吃糍粑,喝糯米酒,还兴致勃勃地观看婚礼上畲民表演的《迎宾舞》,《敬酒舞》,《四角厅》,《取凤凰蛋》等舞蹈。在革命斗争艰难的岁月里,畲汉两族这种血溶于水的情谊随处可见。这说明,民主革命时期,党虽未能制定一整套完整的民族政策,但各地党组织因地制宜,在言论与行动上对畲族平等相待,鼓动畲汉两族人民携手并肩去反抗奴役与压迫,使得畲民去掉疑虑,日渐克服民族偏见,共同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在福建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